

滴水洞中的忧虑

——试析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福建] 汪澍白

1966 年的春夏之交，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半年多来，他一直在外地遨游，同时却紧紧地遥控着中央的政局。5 月，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批判和处理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任命以江青和陈伯达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革”的最高指挥机关。进入 6 月，他又批准中央电台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打开了“造修正主义反”的闸门。正当中央第一线的刘邓等人为造反派的冲击而穷于应付时，毛泽东于 6 月 15 日离开杭州，6 月 17 日悄悄地进入韶山滴水洞，对整个运动的战略决策再作一番仔细筹思。在这里，他还写就了一封与江青倾诉衷肠的信。6 月 28 日，他告别滴水洞，再由长沙乘专列北上，在武汉接到江青 6 月 29 日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拟就的信稿稍加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话，于 7 月 8 日发给江青。发出之前，曾给周恩来与王任重过目。周恩来看到有关批评林彪的内容，便提出，可否由他带到大连给林彪看一下？毛泽东同意了。林彪阅后表示不再作那种提法。毛泽东让销毁此信原件，但保留了一份抄件。1971 年 9 月，林彪折戟沉沙。1972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件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方为世人所知。现将此信照录于后：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

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

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

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这封信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信手写来，不分段落，一气呵成。而且文字隐晦，意蕴深邃。论者见仁见智，理解往往不同。我今日从头细读，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领会以下三点：

第一，疑虑林彪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延安整风以后，党内就有人提出要用“毛泽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毛本人觉得不妥。稍后，王稼祥提出以“毛泽东思想”的命题取代“毛泽东主义”，为多数人所赞同，也为毛泽东所默许。至中共七大，就在党章中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幸喜这时候毛泽东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基本上能坚持民主集中制，倾听群众意见，并注意防止夸大个人作用的偏向。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滋长了好大喜功的情绪，并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逆反心理。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来表明对批判斯大林的矛盾心情。喜的是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在政治上顶住来自莫斯科的压力，独辟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意义。惧的是“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惶惶惜惶惶，不免与受到批判的斯大林有同病相怜之感。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

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在这里,他把服膺真理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从而断言个人崇拜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崇拜谁。他自信一贯正确,掌握了真理,合当受到崇拜。谁若反对这种“正确的个人崇拜”,那就未免有“要求崇拜自己”之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犯颜直谏,被指为篡党夺权的野心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承认三年困难的造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心中不悦,从此就告诫全党,要警惕中央将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在中央领导层中,唯独林彪最喜揣摩上意,趁机逢迎。当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表露出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与不满,他却曲意为之辩护,并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再好一些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就会出毛病。”林彪的谄佞博得毛泽东的欢心。自此以后,便编印语录,在全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进而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将“活学活用”与个人崇拜推向全国。

当“文革”由密谋策划转向公开发动时,1966年5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长篇讲话。一个是大讲“政变经”,另一个是大讲“天才论”,两者都是投其所好。关于“政变经”,毛泽东在信中说:“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评语只此一句,往下没有再加剖析。话锋一转,就着重抒发了对过份渲染“天才论”和个人崇拜的不安。据林彪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比马克思、恩格斯都多。当然马、恩、列宁是伟大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都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自领导过



高举语录本紧跟毛泽东,几乎成了林彪在“文革”期间最有特征的形象。

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后六年就去世了,他没有经历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民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这样就把“顶峰论”的宣传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感到这些话说得有些过头。“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所谓打鬼,就是炮打刘、邓司令部,本是毛林两厢情愿的事。令人疑虑的是打倒刘、邓之后,林彪更欲何为?这是心中的隐忧,不便公之于众,只好向夫人倾吐。

有的研究者认为,如果毛泽东早就察觉了林彪的吹捧是心怀鬼胎,就不会选定林彪为接班人。这种看法未免太书生气了。林彪

的奸险，一般干部与群众中早有议论，不少人甚至为此而以“恶攻”定罪，饮弹毙命。毛泽东身经百战，政治嗅觉极灵敏，他难道反而会对此昏然罔觉吗？九大开幕时，有一个小插曲是耐人寻味的。大会按程序要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并推选大会主席。此时毛泽东突然提议：“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十分惊慌地站起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举手。”全场立即一齐举手。至此，毛泽东同意当大会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毛泽东为什么要作此令人惊诧的临时动议呢？除了对林彪进行心理测试以外，很难作出别的解释。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既然早已察觉了林彪的吹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依然结纳林彪以合攻刘、邓，岂不变成了一种权术关系？殊不知毛泽东平日反复研读《资治通鉴》与廿四史，其中就充满着权谋韬略。在诸子百家中，毛泽东又独独推重法家。法家讲求的就是法、术、势，化用古代的权术与谋略，正是对法家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道出了毛泽东内心的矛盾。批林时，又把它作为“备忘录”印发，这是合理的和可信的。

第二，告诫江青

江青，山东诸城人，1914年生。本姓李，学名云鹤。1933年去上海，闯入影剧界，改用艺名蓝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蓝苹只身投奔延安，改名江青，组织上安排他去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11月，康生从莫斯科飞抵延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江青与康生（原名张裕先）本是小同乡，从此搭上了关系，诸事得到康生的照应。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调去任戏剧教师。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举行晚会，压轴戏是《打渔杀家》，江青早年学过京剧，在剧中扮演萧桂英，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彩。演出结束，毛泽东登台接见演员，同江青握手时说：“你饰萧桂英，演得很好。我们欢迎像你这样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来解放区参加抗日运

动。”自此以后，经过康生的通气安排，江青便直接到凤凰山窑洞里来看望毛泽东，逐渐填补了贺子珍出走留下的空缺。

毛江交好的消息传开，延安的干部与群众对江青人人切齿。中央领导层的张闻天、秦邦宪、何凯丰，部队首长彭德怀、贺龙等都深表不满。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允诺了毛泽东的要求，但对毛、江关系作了约法三章：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

20多年过去了，江青虽然在50年代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时，暗中给毛泽东当过侦察兵，但总算基本上遵守约法，没有在党内外担任要职和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但自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王光美以主席夫人的身份随刘少奇频频出访外国以后，江青顿时萌生了一种失落感。1962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偕夫人来访，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往机场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与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次日，又刊登了王光美与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江青看着《人民日报》，不由得怒从心上起。她跟毛泽东同居20多年，生下了一个女儿，还不许称为夫人。不许参政的约法也到期了，她急于向毛泽东讨得一个名份。

毛泽东也觉得过意不去，终于允许她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外国贵宾。于是，北京新华社9月29日发出电讯：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今天下午接见哈蒂尼·苏加诺夫人，接见的照片醒目地刊登在9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这张照片表明，江青要破雾而出。

此时正值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江青以“哨兵”为己任，刻意搜求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敌情”，借以开展斗争。1963年5月，她与柯庆施组织了围剿《李慧娘》与《有鬼无害论》

的文章。12月,她将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呈交毛泽东,引发了一个惊人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批示下达以后,从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文联及各个协会开展整风,检查工作。待整风告一段落,又由林默涵主稿写了《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周扬认为报告写得不够深刻,没有提出整改措施,将它暂时压下。“哨兵”江青闻讯追索,将这份报告呈交毛泽东,又引发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为了贯彻这一批示,一方面是“破”字当头,点名批判了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文化部门负责人,改组了文化部的领导班子。另一方面,也着手在“立”字上下功夫。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大会,演出了37个新节目。其中《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



每次合影,江青总是站在毛泽东左边。

浜》)、《红灯记》(原名《自有后来人》)。本是前华北与东北地区戏剧会演的优秀节目,江青以革命的名义把它夺取过来,由北京京剧团改编演出,标榜为她树立的现代京剧样板。

《芦荡火种》、《红灯记》以及其他由江青树立的现代京剧样板出台时,毛泽东都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并接见演员,合影留念。每次合影,江青总是站在毛泽东左边。她俨然是文艺革命的先锋,甚至以旗手自居。

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她并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1964年,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没有答应。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以“退田”影射“单干风”,以“罢官”影射“翻案风”,触及1962年以来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一些敏感的分歧,为各方所瞩目。姚文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打响了“文革”的前哨战。接着,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又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会后形成《纪要》,由陈伯达、张春桥修改,并增补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

内容。经毛泽东亲自审改三遍。然后,由林彪写信向军委领导人推荐,再上报中央,于4月1日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名义批发全党。《纪要》最突出的内容是,“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肯定15年来被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代京剧样板的出台,打开了黑线专政的缺口,呼唤着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纪要》为江青作了一番旌表之后,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正式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

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扶植江青呢?他难道不知晓江青早年的肮脏历史和同居以来的种种乖戾表现吗?对那一切,他的确是心知肚明的。问题是,自1962年他同中央第一线产生意见分歧以来,在领导层中处境日益孤立。为了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他苦心培植了两个助手:其一是一贯吹捧自己并掌握了军权的林彪;另一个就是“文艺革命先锋”江青。江青的好处是,可以作为一条“咬狗”,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她的弱点是,虚荣心与权力欲太重,缺乏自知之明。为此,毛泽东特为从解剖自己入手,给她打一剂预防针。“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致黄琼书中这几句话,既可引以自律,也可用以告诫江青。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自己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联系后来的发展,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结成一伙,“得志更猖狂”。毛泽东又反复告诫江青不要开钢铁工厂与帽子工厂,不要搞“上海帮”或“四人帮”,江青还是听不进去。

毛泽东在信中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其实,毛泽东的弱点,恰恰在于

不愿严格解剖自己。“大跃进”跌交之后,他不但没有认真检查自己,而且还把敢于直言进谏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对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较为实事求是的检查,也都耿耿于怀,终至积不相能,势如冰炭。我认为,此信对自己的剖白,着眼点在于告诫江青。

第三,瞻念“文革”前途

毛泽东热情赞扬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亲手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他对“文革”寄予了厚望,但也担了很大风险。他有很高的自信,但也有挥之不去的忧思。

毛泽东心目中的敌手刘少奇,在党内外也有很高的声望。早在10年内战时期,刘少奇就已成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开始安排他协助毛泽东做中央的领导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奉命由苏北调往延安,出任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3月,中央通过《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刘少奇一身兼负5项要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并主管华中局的全面工作。

在1945年4月4日的中共七大,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论述。在同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行主席职务。1947年3月,蒋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分两路撤离延安。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率军留守陕北,与蒋介石、胡宗南周旋;另一路则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赴河北平山开展工作,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排在六位副主席之首。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刘少奇为副主席,排在四位副主席之首。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

建议。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处于中央第一线,主持各项政策的调整,扭转艰难局面。刘少奇的声望逐渐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扳倒刘少奇,按照组织原则,是通不过的。单靠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这些人的支持,也是不能成事的。毛泽东的优势,主要是他在群众中的威望高,凭借这一点,大力宣扬个人崇拜,再加上枪杆子的镇慑力量,毛泽东准备撇开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炮打司令部”的斗争。这是出人意料的战略部署,很可能出奇制胜,但前途也存在着一些变数,不能不令人耽心。“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沉重不安的心情跃然纸上。这种不安还表现于对身后的耽心:“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他写信时,预料两派斗争将很激烈,但左派终将取胜。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毛泽东病情加重,一次他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呢!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情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

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已不再像十年前给江青写信时那样自信甚高,而是充满着忧危惶懼的心情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信中提到的“左派”和“右派”,都以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为划分标准。1957年整风反右时,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文中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两条。”而在执行中,又以如何对待党的领导最为切要。当年只是由于对本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提了一点意见,就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而划为右派者,大有人在。到1966年发动“文革”,明确地提出“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还提出要“炮打九级司令部”。所谓司令部,就是各级党的领导。聂元梓、蒯大富等人敢于在北大清华带头造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反,就成为响当当的“左”派。陈毅、叶剑英等老师1967年2月在怀仁堂的会议上强调群众运动要有党的领导,发泄了对造反派和“文革”的不满,就被斥为“老机”“老右”。对待党的领导,1957年要保,1966年要反,标准的确在跟着毛泽东的需要而发生变化。

再过10年,到了1976年,毛泽东方知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因而在“政治遗嘱”中表露出忧烦沮丧的思绪。果然,他刚刚逝世,极“左”派的“四人帮”就被一举粉碎。稍后,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否定“文革”,恢复了毛泽东首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按照信中的说法,这就是一场“右派政变”。迨至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一些“左”派人士又祭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和平演变”的语录重新活跃起来,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局面,恢复毛泽东晚年所推行的极“左”路线。无奈死灰不可复燃,他们的幻想旋归破灭。信中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终究不过是毛泽东用以自慰的一句套话而已。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